

抄书痴与抄书情结

陈汉玉 陈为

书痴有多种，除读书痴、藏书痴、刻书痴、校书痴外，还有抄书痴。

抄书成痴者，开始多是为了获得自己没有的书籍。

有些人幼时家贫，想读书又无力购买，只能借书来抄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习惯，即使后来境况改变，衣食不愁，抄书的嗜好也无法丢掉，如清代章学诚的父亲章铤。

有些人家中并不贫困，甚至还是显宦之家，但生性喜抄异书，特别是见到“亡诗、逸史、鲁壁、汲冢”等罕见书籍时，胜如见到奇珍异宝，越抄越上瘾，无法控制自己，如宋代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。

抄书而成痴，实际已把抄书作为人生一大乐事，一大享受，因此至老不疲。

明藏书家钱允治，82岁仍在抄书。一次正值三伏暑热，他抄补《水经注》，连抄十日不止，遭到坐客讥笑。他在卷末特地作《跋》记载此事，并欣然说明：“老人殊不苦也”。

清学者卢文弨也如此。他撰《严豹人二酉斋记》论说抄书痴的性情时，述及自己的同感，说自己“已颓然老矣，然见一异书，眼犹为之明”，总想向人借抄。抄书对常人来说是件苦事，对抄书痴却是享受，正因苦乐相反。卢文弨喟然感慨：“余今白首抄书，矻矻朝夕，亦正有自不可解者！”

对抄书痴来说，抄书有时还是疗贫的良剂，解愁的秘方，危难动荡之时，还能作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。

清兵进取江南时，学者冯舒心系南明，避到乡下，当时“大海横流，人情鼎沸”，“屋小炎蒸，无书可读”，百般郁闷之中，偶于架上拾得郭忠恕的《汗简》，于是精神振奋，发兴书之，二十日而毕。他的家人讥笑他说：“世乱如此，挥汗写书。近闻有焚书之令，未知此一编者，助得秦坑几许虐焰。”冯舒自己也觉可笑。又三年后，南明政权益发风雨飘摇，江南一带或“昏风怪雨”，或“怪风疾雨如秋深”，这种凄惶惨淡的时光，冯舒是靠抄录《潜夫论》等书籍捱过的。

古往今来的抄书痴一般都对书有着一种莫名的迷恋。这种迷恋有时可以超乎常情：明藏书家祁承 为了置书，不但把妻子首饰典卖一空，还要手录古今四部图书数千卷，直抄到“十指为裂”；清天文学、数学家焦循，当大水淹到家门口时，还在南窗下从容不迫地抄录《中论》。

抄书痴绝不同于某些附庸风雅的藏书家，他们对书是真爱，把书看得重于田园家产，要于身体发肤，唯其如此，抄书才在他们身上变成压倒一切的举动。

对书的迷恋达到极致时，抄书还可以成为文人的终身行为。清代书痴鲍廷博、管庭芬，都是身为诸生却绝意进取，一心聚书、抄书，直至告别人生。

鲍廷博生于乾隆盛世，却“生而笃好书籍，于人世一切富贵利达之足以艳人者，举无所概于中，而惟文史是耽”，他喜欢收集秘籍，走到哪里，都带着纸笔，“偶闻他处有奇文秘册，或不能得，则勤勤假钞厥副，数十年无懈倦。”他与江浙一带著名藏书家频繁交往，互相借抄，并广录先人后哲所遗手稿，八十余岁仍往来于杭、湖、嘉、苏数郡之间，所抄书籍不计其数，仅流传至今有名可稽者即有 140 余种。不幸的是，鲍廷博垂暮之年贫病交加，不似钱允治、卢文弨仍能享受抄书的乐趣。戴光曾述及鲍廷博八十六岁过访戴时的情景，说他“形神枯槁，索然意尽，新患头疽，虽愈而窘态日甚，心计日粗。询以近况，白云生平以书为命，今开卷辄忘，精神不能检束，藏书已散，不复向此中讨生活矣！”一代书痴丧失了聚书、抄书的能力，无异于失去生命的源泉，第二年便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管庭芬生于封建王朝即将倾颓之时，更是抄书成痴。咸丰十年战乱时，他奉母避难乡曲，每日以抄书为事，两年之间，就抄有小品七十余种，当时，“其寓仅破楼一间，日藉笔砚以消郁垒，笈携小品尽手录之，不足复于村塾及邻近告借以续之”。管庭芬一生所抄图书不下数百种，现今可以列出名目者就有二百五十余种。海昌（今浙江海宁）文人中，管庭芬与潘霭人均以抄书闻名，潘喜抄名人文集，管喜抄海昌掌故及目录学文献，后来潘转事科举，而管仍抄书不辍，自甘冷淡，以至好友姜殿扬戏问他，是不是准备用纸来填饱肚子？管庭芬曾作《典衣买书歌》，表明自己的志向：

天涯有客芷湘子，青山懒隐隐村市，
贫居陋巷无所求，愿与史籍同生死。
既耕还读甑屡虚，仰天狂笑心不舒，
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供我岂乏今古书。
叩门喜接西吴客，一笑相逢皆秘册，
绕床其奈阿堵无，欲舍仍留费筹画。
緇袍挂体春衣闲，呼童且质钱刀还，

奇文换得自欣赏，胜绝梦游琅嬛间。

芸香谨贮心亨室，雠校乐可销永日，

丹黄涂乙且啣唔，两手晨昏少停笔。

这种“愿与史籍同生死”的志向，恐怕是古往今来抄书痴精神境界的顶峰了。